

贫贱不能移 那孟子为何还要辞职

贫贱不能移。这是孟子说的，那孟子是不是不在乎贫贱呢？

话是这么说，可孟老师手头不缺钱，给他年入千万，他还不乐意呢。

我们来看看孟子的情况。他老人家在齐国当国卿的时候，年薪是10万钟粟。这是个什么概念？以齐国的经济情况作为核算基础。根据《管子》的记载，在春秋时期，齐国一百亩田的粮食产量为二十钟粟，那么，十万钟粟相当于50万亩耕地一年的粮食产量。

考虑到战国时期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提高，那么，十万钟粟至少也相当于十万亩以上耕地一年的粮食收成。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十万亩以上田地的收成，就算过去的一亩地的实际面积不如如今，那也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从当时的购买力来计算孟老师的年入，《管子》又记载：十钟粟可交换成一镒黄金，一镒相当于二十两或者二十四两。十万钟粟就是二十万两或二十四万两黄金。先秦时期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14克到16克之间，十万钟粟至少相当于300万克黄金，如今的黄金价格为每克300多元人民币，那么十万钟粟相当于9亿元！

战国时期的黄金价格不可与今日相提并论，那么还是《管子》的记载，一镒黄金可供一百辆战车及其驾驶员一宿的费用，孟老师一年的收入可供一百辆战车一宿的费用！

《管子》讲的是春秋时期的事，但此书成于战国时代，而孟子是拿的战国时候的薪水，以上计算还是有合理之处，孟老师的年薪按照当今的购买力，可能不少于一亿元。

孟老师在齐国拿了几年高薪水，可是老板对他的策划没什么兴趣，重大决策时总把孟老师晾在一边，尤其在攻打燕国的决策上，主张和平的孟老师一向反对用武，雇佣方和被雇佣方犹如鸡同鸭讲，于是，讲究浩然正气的孟老师辞职。

齐王也觉得蛮愧疚的，既然不能用孟老师的策划，那就把孟老师当大师养起来吧，他托人向孟老师转达了自己的建议：孟老师，您还是别走了，既然辞掉行政职务，那我给你一个大师头衔，给你在国都的黄金地段建一个学院，让您讲学，年薪一万钟粟，好不好？“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

从十万钟粟“唰”一下降到一万钟粟，降薪九成！这不只是欺负孟子，简直是欺负文化。

孟老师的生气，主要是为理想不能实现，同时也是为齐王不长脑子的乌龙做法。人家辞职了，你就客客气气打发人家走，既体面又客气，用一份年薪只有原来十分之一的工作来挽留人家，聪明人谁愿意留下？

孟老师周游列国，没有固定职业，但待遇高得吓人，这引起了某些人士的不满。有个叫彭更的先生就对孟老师发难了：孟老师，您这些年在外面走动，光是马车就有几十辆，简直是一个大车队，后面还跟着几百学生，这么大张旗鼓地在各大诸侯国之间活动，不免也太嚣张了吧？

孟老师毕竟是大师，一点也不慌张，他淡定地回答：人家乐意给我高薪，我也没办法，因为他们看重的是我的策划，是我的“道”，他们不是为我的温饱买单，而是为我的策划买单，如果是这样，就算

他们把整个公司让给我，我都不觉得嚣张；如果他们只是为养活我而给我待遇，那么，哪怕是一个盒饭，我姓孟的都不会接受。

“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可谓霸气侧漏。

要有薪水，必须得有工作，而对于工作，孟老师的观点很鲜明：无论是谁，都必须得找工作，没有工作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他曾经对周霄说：祖师爷孔子如果连续三个月找不到工作，没有老板聘用他，他就会惶恐不安，出外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履历。“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

孟老师还引经据典地认为：如果一个人连续三个月找不到工作，那么大伙就得赶紧去给他做心理咨询了。

跳槽后对于前任老板的态度该怎样，他对齐宣王明明白白地说：老板采用我的策划，员工因为有事不得不辞职，老板客客气气地给他船票车票，还负责派人带路，辞职三年不回，这才消除档案清理办公室，如果这样，辞职员工应该终生尊重前任老板。如果老板对我的策划不理不睬，一旦不得不辞职，又连骂带打地赶人，走了不到三分钟，档案销毁，收回办公室，这样的老板，你就终生不要想起他。

从这番谈话可见，孟子多少带点刺头的味道。当然，如今的情况不同于战国的情况，人走了，就得自动清理好办公桌。像孟子那样还要老板三年不动你的东西，这显然是浪费行政资源。

（摘自《广州日报》）

谈古论今

利民为本 令行为上

■李斌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锦。”明代苏州知府况钟，就是昆剧《十五贯》中“况青天”的原型，素以廉吏著称。况钟主政前的苏州，主办织造的大监、往来卫所军官、本地乡宦豪富相互勾结横行无忌，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本该上缴朝廷的赋税却又连拖带赖。况钟先是坚决打击妨碍政令施行的宦官豪强，接着亲自调查核算赋役情况，上报朝廷核减税粮、废除苛捐。据《明史》记载：况钟“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治国常有，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放之整个治理体系观之，地方政府处在政令下传、民情上达的纽带环节，官员犹如来回穿行的飞梭，在国政与民情间穿针引线、牵线搭桥。况钟之所以受百姓拥戴，就在于他对上忠诚担当，不与豪强同流合污，对下则纤细周密保养民生。所谓“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地方官员的职责担当，不可不谓之关键。

一位干部说得好，在今天的中国，当“官”是门技术活。这个“技术”，并不是什么驭人之术、晋升之术，更不是什么敛财之术、欺民之术，而是指沟通上下层级、融通党心民意的连心术、实干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易。一些干部习惯于服从上级，只讲对上不管对下，许多举措与民意相左，惹得百姓意见不小。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对上负责”，不如说是“对上糊弄”。也有的干部，总是以本地的差距和特殊性为借口来敷衍上面的政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对上负责陷于停摆，对下负责也沦为空谈。

“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谈到地方干部的工作职责，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告诫。为党分忧、为民尽责是党的干部的天职。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是没有资格做领导工作的。“向上看”意味着，工作应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进行，不折不扣把中央的政策传递好、落实好，讲忠诚重看齐。“向下看”则意味着，用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检验工作成效，根据群众的困难和忧思校正政策指针。

党心齐，党员干部就有力量。人心齐，党的执政基础就坚固。从本质上讲，“向上看看”与“向下看看”并不矛盾，二者统一于党的宗旨和初心。所谓上下同欲者胜，党心民意相映生辉，事业发展就能所向披靡，政通人和的善治理想才会成为现实。今天，我们正处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节点，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应有关键担当、积极作为。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诠释执政理念时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万事胚胎，皆由州县。”领导干部当好亲民之仆、治事之官，老百姓内心始终都有一片艳阳天。传统观念里，“有力量济人谓之福”。对领导干部来说，用好手中职权去经世济民，是不容懈怠的职责，也是一种超越世俗快乐的幸福。

老照片

上世纪50年代登上《人民画报》的“网红”之王文斌、张淑云



石景山发电厂厂长王文斌。



大玉乡张淑云在田里采棉。（新浪）